

新冠大流行把人類社會拋入了一個羅爾斯時刻，人們亟需進行一場新的思想實驗，在無知之幕的狀態下，尋找公正的解決辦法。需要指出的是，羅爾斯的思想實驗局限於封閉的民族國家，新冠大流行及其後果遠遠超越了這一框架，由此產生的正義問題也需要新的政治維度來承載。

新冠疫情與無知之幕

黃鳳祝

新冠疫情影响全球蔓延一年有餘。因為疫苗短缺和病毒變異，許多國家不得不再延長隔離措施和旅行禁令。長期封鎖導致經濟活動停頓，大量企業面臨破產，低收入人群經濟狀況惡化，社會兩極分化和不平等的現象日益加劇。緊急狀態的常態化侵蝕了原有的社會契約，由此引發了一個新的問題：如何在新冠大流行時代維繫社會正義？

今年是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 一九二一—二〇〇二) 誕辰一百周年，也是《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 一九七一年) 出版五十周年。羅爾斯在這部著作中，對於如何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進行了探討。這部有關公正的論著也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哲學著作之一。

「無知之幕」下之「原初狀態」

羅爾斯在書中提出了一個思想實驗：

在「無知之幕」的背後，即在屏蔽個體性別、種族、社會地位、天賦和偏好的前提下，面對未來社會最重要的基本物資，參與者如何制定分配方案。處於這一虛擬決策環境中的人，被要求對未來的社會秩序作出選擇，但是無從知曉自己在未來處於何種位置以及能夠獲得多少利益。羅爾斯指出，在決策過程中，參與者是自利的，但是由於信息缺失無法權衡利弊，將會傾向於兩個正義原則：一是自由原則，即人人享有自由和參與的基本權利；二是平等原則，即公平的機會均等，在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條件下，使處於最弱勢的人能夠獲得最優的前景。

羅爾斯的立場是，如果社會中處於最弱勢的群體受到被忽視的威脅，他們可以行使否決權。

在新冠疫苗短缺時，把疫苗優先分配給高危人群，關乎社會正義：因為疫苗屬社會基本物資，不是普通商品，應該面向所有社會成員，而死亡風險最大的社會成員應該優先得到保護。

在「無知之幕」的狀態下，不存在特殊的個人利益，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不是對立的，而是和諧、公平和正義的。由於個體不知道自身的利益所在，不會為了爭

取一己私利進行理性計算，由此作出的決定，也不會傷害到他人的利益。「無知之幕」是羅爾斯正義理論的核心，在此基礎之上達成新的社會契約。這種「原初狀態」，不同於盧梭的「自然狀態」，不是經驗的現實，而是一種虛擬的要求和假設。

按照羅爾斯的要求，參與建立社會契約的人，必須戴上「無知之幕」。其深層道德意義在於，現實中的人必須忘記自己的出身、地位、利益和欲望，作為一個平等、獨立和自由的人，運用最高理性，也就是道德理性，進行思考。絕不能以強者或多數人的利益為前提，而犧牲弱者或少數人的利益。羅爾斯假定，在這種「原初狀態」下，所有人都是一樣的，沒有彼此對立的利益，因此可以建構出一個公平的社會契約。

自由和平等是個體生活的追求

在此，羅爾斯試圖把個人至上與正義至上結合在一起，他的理論兼容了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個體的尊嚴在於人是自主的，受到法律的保護，同時免於被剝削和被邊緣化。

康德的實踐理性，是借助先驗的範疇

和理性的規範，把善作為道德追求的目的。康德的正義理論是經由直覺和理性的規範建立的。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受到康德批判哲學的影響，但是排除了先驗論，純粹從經驗的假設出發。他認為，道德實踐的基礎是理性和經驗的理解，即人對自身的理解。自由和平等是一切個體生活的追求。

人的生活實踐受到主觀性和生存需求的規範，一切活動皆從主觀利益出發，是自利的實踐，但是自利並不一定自私。個體不願被他人利用而犧牲自己的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個體必須明確，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他者的利益，把他人作為自己獲取利益的工具。保證每個社會成員的自由與平等是所有人的期待，不能以集體利益的名義犧牲任何個人利益。社會成員如能基於這一理解達成共識，那麼無需強制性的法律或規範性的道德，即可建立一個全新的公正的社會契約。

正義的社會是來自理解

羅爾斯的「無知之幕」，與老子的「無知無欲」和莊子的「坐忘」有相通之處，《大學》、《中庸》所推崇的「慎獨」和「意誠心正」也是如此。這些道德實踐，

皆是來自個人的理解和悟性，而非通過規範和強制性的措施。正義的社會是來自理解，而非法律強制或道德規範的產物。

新冠疫情加劇了社會的分配鬥爭：疫苗短缺引發道德危機，醫療保障體系不堪重負，長期封鎖導致社會風險失衡，機會均等受到剝蝕。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弱者與強者、少數與多數、代際之間以及國際之間的對立和衝突日趨尖銳，導致社會走向動盪與分裂。

在羅爾斯看來，自然分配談不上公正還是不公正，公正與否取決於國家在分配問題上如何作為。面對新冠疫情，公正與否，取決於國家和國際組織如何應對疫情對社會造成的影響。

新冠大流行把人類社會拋入了一個羅爾斯時刻，人們亟需進行一場新的思想實驗，在無知之幕的狀態下，尋找公正的解決辦法。需要指出的是，羅爾斯的思想實驗局限於封閉的民族國家，新冠大流行及其後果遠遠超越了這一框架，由此產生的正義問題也需要新的政治維度來承載。

（作者為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原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